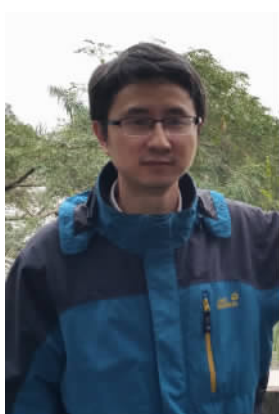


有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理论逻辑

谢昌飞 王临霞



【内容提要】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突出特征在于针对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而寻求积极拯救方案呈现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它一方面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承继性，力图结合西方工业文明社会出现的新状况展开集中分析；另一方面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内在关联，希望在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寻解决生态问题的新方案。对此，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加以分析和进行深刻反思，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哲学批判

作者简介：谢昌飞（1982-），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讲师、博士（吉林长春 130024）；王临霞（1991-），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4）。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方法、以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揭示为基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落脚点，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理论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构成其与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相区别的重要标识。

一、人与自然对立的化解——有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所关注问题的逻辑进路是从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出发，从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被普遍异化的现实状况中分析其内在根源，指出资本增值的需求造成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就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的实践和生产活动中被纳入马克思的问题域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一致，有机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当今社会所面对的严重问题——生态危机入手加以分析和考察的；而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之处在于，有机马克思主义没有看到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而是直面人与自然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恶化就是造成生态文明的最终根源，这一区别使其从一开始就直面人与自然对立关系并将其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

1. 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作为柏拉图哲学注解式发展的全部西方哲学以及笛卡尔以降带着主客二分的眼镜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仅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洗礼，更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如火如荼。而随着资本执拗地将对自然的横征暴敛与对他人的精细盘剥的单向度发展逻辑掺杂进这种绵延了几千年的主客二分的发展观以及在现代欧洲广为流传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中，其僵化的、生硬的机械性与形而上学性便遭到了彻彻底底的暴露。

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的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因为,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是迄今为止一切生产方式中最有生产效力的,但它由于自身的对立性质而包含着生产的界限,它总是力求超出这些界限,由此就产生危机……另一方面,为生产而生产因而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面。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① 资本的逻辑已经强硬的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撕裂,顽固地将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斩断,使得自然、人和社会都成了资本生长的营养品,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必然。

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强烈认同这一判断,并认为这一逻辑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中已经被放任的企业资本家掌握得淋漓尽致,于是“我们知道放任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达到股东追求短期利润的目标,往往以牺牲他人和环境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于是“我们预料到,当某一市场或国家的资源枯竭时,跨国公司就会转移到能够给它们带来更高回报率的市场”^②;于是我们看到从陆地到海洋,从亚马孙原始森林到撒哈拉沙漠石油,从最小的蜂鸟到最大的鲸鱼,一切自然资源都遭到了资本穷兵黩武式的攻伐,被资本以商品的形式到处兜售。而商品的出现不仅成为资本最骄傲、最珍视的“宠儿”,也成为资本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发展观进一步强化的地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有机马克思主义也认同“商品拜物教”的说法,认为资本自信地以琳琅满目的商品使雇佣劳动工人陷入了“商品拜物教”而无法自拔,于是雇佣工人在对更多商品的追求中经历了从不得不到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的剥削与压榨的痛苦历程,这一说法类似于马克思的“异化”,也大体趋同于卢卡奇的“物化”。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剩余价值与高额利润的不断涌现,资本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对立变得进一步强化。似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要将一切自然资源与一切雇佣劳动都用来为它的突飞猛进献出生命、做出牺牲,资本的发展必定要以一切自然资源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作为垫脚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可以纯粹的只从个人利益出发”^③,而不顾及他人,这就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面对这种状况,马克思选择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建立在怀特海过程哲学基础上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主张生态和谐优先于机械控制”^④,主张万事万物相互勾连、和谐发展,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机体并处于生生不息的有机联系过程之中。以有机的思维方式看待周围的世界,自然界与雇佣劳动工人才能在“资本中心主义”中得以祛魅,才能从工具理性、精于计算、物欲横流、横征暴敛充斥的市场经济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发展。事实上,制度本身的固有问题能否仅仅依靠思维方式的变革就彻底改变,显然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革命,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不彻底性已然开始暴露。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中心主义”标准时认为,该标准成为人和自然关系对立的必然结果。

在论及财产的“非经济起源”问题时,马克思指出“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3页。

②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7页。

③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④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①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尊重自然对于劳动的先在地位，相反自然成为人劳动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这一逻辑使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初始逻辑对待自然，相反确立了自身的一套新逻辑，即资本逻辑——以实现自身增值为根本目标，而导致资本增值成为一切的终极目标。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类似,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取向的经济”,其中人与自然被分离为截然对立的两极:作为没有生命主体意志的自然和拥有至高主体价值的人,两极的区别不仅是非此即彼的,更体现为一种层次性,主体成为价值的评价者,成为一切利益所需要考虑的群体,而客体则成为满足主体需要的条件而已。这样的认识逻辑必然将自然的双重属性彻底分离,“主体的自然”和“客体的自然”^②的双重属性人为地对立并实体化。这个“主体的自然”和“客体的自然”相分离的过程,不仅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和谐的共存的先在状态中脱离出来,更使人的“生产的原始条件”变成了“生产的结果”,“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物质财富生产,在本质意义上说,“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③。

这一必然性的鲜明体现在于“经济中心主义”，即“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资本积累——创造和增加财富，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④，“不管是对于地方市场还是每一个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都要求其 GDP 持续的增长”^⑤，自由市场经济自其发轫之时就一以贯之的将 GDP 视作衡量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似乎资本主义社会幸福不幸福，进步不进步，发展不发展只能体现在 GDP 上。于是一切向 GDP 看齐，一切以 GDP 论英雄的行为不仅推动着资本趋之若鹜于对自然的盲目征服与肆虐践踏，更促使资本迫不及待地对雇佣劳动工人展开愈加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唯 GDP 论英雄”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已经彻彻底底地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共同福祉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冷漠抛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逐步堕落为一种纯粹“一元主义”的经济，一种不道德的经济，一种竭泽而渔式的经济。于是“唯 GDP 论英雄”的资本被自己的贪婪性遮蔽了双眼，它似乎只能看到 GDP 的指数增长，却看不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虚假泡沫，看不到自然资源正跌进濒临枯竭的深渊，看不到人们之间的正义正变得不正义，自由正变得不自由，平等正变得不平等；它似乎只习惯于断裂式的发展而吞噬掉整个社会的共同福祉，不管是对于当下，还是关于子孙后代的未来。“经济中心主义”的确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不计其数的物质财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但我们更应看到其背后是以人自身与自然资源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经济中心主义”“使成千上万的人失根，令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导致犯罪率上升，瘾君子增加，家庭破碎，大量穷人在冲突中丧生，毁灭了世界的森林，穷竭渔业，侵蚀了表土，加速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它改变了地球的气候，这种改变很可能对我们的后代带来致命的伤害”^⑥。因而“经济中心主义”非理性的一元化思维与发展方式遭到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柯布等人的批判与反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1-7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④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⑤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3页。

⑥ John B. Cobb, Jr., *The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 42.

所以,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唯GDP论英雄”与“经济中心主义”的反思构成有机马克思主义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独特之处。它的作用在于,让人们清晰地看到,我们知道马克思这样指出,人通过劳动所拥有的“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而“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①

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简单否定“经济中心主义”不同,马克思更将“经济中心主义”看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予以审视,资本主义是在实现资本自身增值过程中完成了社会从封建制度向新社会形态的进化,证明“经济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逻辑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和空间上的同构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的消亡,其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观念形态所取代。因此反“经济中心主义”不仅仅是反对“经济”的绝对中心地位,而更应放在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批判的维度上加以不断审视,这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所在。

2. 有机马克思主义反思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立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中,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声几乎不绝于耳,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努力找寻到新视角——“错置的具体性”^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十分青睐“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主义”能够在其严密的演算中为其提供精确的经济数据,而这些精准的数据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量化表达。在资本的运行过程中,“把固定资本看成既定的、不变的,它不加入价值增值过程”,自然的消耗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中所认为的必要,自然的存在被置于人的对立面,消耗自然如同人的发展一样,都那么理所应当^③。所以资本喜欢以各式各样的公式去运算,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也习惯用数字来表达可以衡量的一切。不得不说,在可以用数字进行精准表达的地方,“科学主义”都竭尽全力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找到可靠的答案,为其提出精准的发展方案。

但是,“科学主义”的精细运算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那就是“科学主义”“用假定代替了现实”^④,误把抽象的结论当作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认为根据各种公式精心演算推导后的结论能够正确反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然而,实际情况是,假定的、抽象的东西在经历了“科学主义”的加工后变得普遍化,使其自始至终都不是具体的实际情况。例如,“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人均GNP看作市场是否健康的信号”,“是衡量福利的完美工具”^⑤,甚至“被国际金融机构用来衡量不同发展计划”^⑥,但“GNP衡量的只是福利的某些层面,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福利的指标,忘记这一点就是典型的错置具体性谬误”^⑦。因而在“科学主义”化过程中,那些具体的东西都被抽离了,把得到的抽象的、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结论视作具体的结果显然是一种误置抽象为具体的错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4页。

② 〔美〕赫尔曼·E.达利、小约翰·B.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3页。

④ Zay Mehmet, *Westernizing the Third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8.

⑤ 〔美〕赫尔曼·E.达利、小约翰·B.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3、65页。

⑥ 〔美〕赫尔曼·E.达利、小约翰·B.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⑦ 〔美〕赫尔曼·E.达利、小约翰·B.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除了“误置具体性谬误”的风险外，“科学主义”也直接加剧了“工具理性”的使用与扩张。“工具理性”为了完成“科学主义”越来越精细化的任务不得不使自身也忙于计算，这种计算从对自然资源，到对客观环境，最后绵延到对人自身。于是“科学主义”驱使下的“工具理性”不再把自然摆在自由发展的位置上，不再把人当作合目的性的人，自然与人仅仅被当作一种工具加以看待。“固定资本作为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逐渐耗尽的资本，其使用价值的规定就是：固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作为手段被使用，并且它本身只是作为使原料变为产品的作用物而存在。作为这样的生产资料，它的使用价值可以归结为：它只是生产过程运行的工艺条件……或者，它是真正的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的直接条件……而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只是在生产范围内并为了生产才被使用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使用价值。”^①

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工具理性”，这二者的发展依然是以牺牲人与自然的发展为代价的，依然使得资本与自然和人的对立变得越来越清晰，使得资本与自然和人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不可逾越。所以柯布指出，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将我们带入可怕境地，我们应该审慎对待。在对待科学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②但是，马克思也曾高度评价科学立场或科学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重大作用，因此针对这一问题也需要辩证理解与区分科学手段与目的、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似乎并未涉及。

二、人与社会对立的和解——有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研究必须正视一个前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③这就表明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针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直接回应人与社会问题的逻辑进路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人与社会关系的前提，在对人与自然关系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又展开了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从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反思的视角——形而上学的机械发展观、“唯GDP论英雄”“经济中心主义”“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来看，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立足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二元对立的无限制经济增长方式，认为其既是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更是造成人与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他们将这一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中的体现总结为“‘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富人‘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的正义不正义”。实际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不谈所有制和阶级问题，就没有抓住事物的要害，不可能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而也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1. 自由市场不自由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自人类诞生开始，人与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到“自由”再到“不自由”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穿越了茹毛饮血的相互攻伐时代，摆脱了人对人的“奴役”，卸下了中世纪沉甸甸的负担，在启蒙的光辉下获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1-7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15页。

理性与自由。然而理性高居于神坛之上、俯视众生的“人类中心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却再次将人类刚刚获得的“自由”倒退至“神话”的起点，“把人们最为关心的人权中的‘自由’同竭尽所能而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的所谓自由混淆起来”^①，将人类残暴地拖入“不自由”的“新”时代——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经济自由的时代。

于是资本逻辑暴露出暴殄的天物性：一部分人的经济自由不仅在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加法逻辑中被湮没，更在以最少的资本彻底垄断这部分人经济自由的减法逻辑中被葬送；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血淋淋的事实——“资本主义催生了这样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他们的辛苦劳作没有给他们带来财富和舒适”^②，“那些有经济实力的富人对财富的过度攫取导致大约世界一半人口——超过30亿人口人均每天生活开销不足2.50美元”^③，所以这样的事实充分证明，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经济自由在市场经济与资本的驱使下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于是精于计算的资本可以肆无忌惮地支配工具理性忙于对另一部分人，也就是对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贫苦阶级进行奴役，毫不吝嗇地暴露出其“奴隶主义”态度，使得价值理性在过度的压制与挤压中逐渐丧失生存空间。最终，以工具理性引以为傲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真的在“单向度”的发展中不断摧毁着，异化着，甚至奴化着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使广大贫苦阶级的经济在所谓的“自由”关系中变得“不自由”，终于沦为高傲的资本以及另一部分真正享有经济自由的富人阶级的“阶下囚”。“最富裕国家通过设计、主导世界经济体系而使他们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对于全球日益贫困的底层大众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奴隶制市场。”^④

所以，在这个经济“不自由”的奴隶制市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的贪婪资本一方面急于给贫苦阶级带上冰冷的枷锁，将其囚禁于市场经济的牢笼之中，另一方面又忙于将富人阶层推向主宰他人的霸主地位，将自身所谓的经济“自由”建立于肆意蹂躏和践踏他人“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

这一对自由的理解表明，有机马克思主义将“自由”建立在人可以充分且全面地在经济生活领域掌控自己的命运和选择，这与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以必然性为前提，从自然的角度说，自由意味着遵从自然必然性的要求而彰显人的能动性；从历史的角度说，自由意味着尊崇历史必然性而实现对历史的创造，“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⑤。这就表明人的自由不仅体现为经济的自我主宰性，更体现为人更全面地占有社会关系以及人能更淋漓尽致地彰显自身的能力，这样的自由是历史性过程，是人不断克服自我异化的过程，抑或是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

①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

②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

③ <http://globalissues.org/article/26/poverty-facts-and-stats#src1>。

④ [美] 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173页。

2. 穷人、富人“不平等”

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过是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对立的表现，但这样的对立却难以通过“回到自然”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是鲁滨逊一类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①。所以，正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对立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平等问题就是这样的关键。

而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其发轫之时就借助宗教的外衣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身份明确固定下来，一些人被“幸运的”作为“选民”而拥有更多、更正当追求财富的权利，而另外一部分人则只能作为“贱民”被迫接受其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开始起步发展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甚至合法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地位：一部分人必然遭受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伴随着这样的资本逻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已经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发展到极致，即无产阶级必然接受资产阶级的无情剥削与压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不均都是合情合理的，当资产阶级这样的“精英阶层变得更富有时，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差”^②，也是毋庸置疑的。

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精英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贫富差距、阶级不平等已经演化到了极致。“一部分人就可能让国家的大多数人没电可用，一小群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切断输送给美国东部天然气的供应”^③，这部分数量不到20%的精英阶层彻彻底底地掌控了人民的生活，彻彻底底地垄断并私自占有了那些本应平等分配的资源。除此之外，美国的大财阀与大资产阶级又开始使各种本应体现平等人权、平等追求财富的政策变得不平等了。例如美银美林发布的1917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分配图表显示：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直线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已经升至22%。不难看出，无论是医疗保险、税收还是某种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产阶级在制定这些政策与规则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平等仅仅是局限在资产阶级自身之上的，而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与机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人人平等”。当然，美国的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接受这种不平等地位的最直接手段就是用数不尽的商品为他们堆砌了一座“围城”，让他们在这座“商品拜物教”的迷城中崇拜于此，纸醉金迷于此，异化于此，从而最终心甘情愿地固化于此。所以说，资产阶级运用这样的资本逻辑让无产阶级麻木于赤裸裸的剥削，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人与人之间不可撼动的、僵化的经济不平等地位在司空见惯中进一步习以为常。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阶级不平等，就是指“富人所创造的全球经济体系，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巨额利润，却使数十亿人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④，这样的经济体系使“权贵人士享受着他们身上的舒适和技术提供给他们们的玩物。相比之下，那些遭受穷困之苦的人们，尽管他们人数众多，却无法通过政治或教育的力量推翻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制度”^⑤，因而必然带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3页。

② 〔美〕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00页。

③ 〔美〕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57页。

④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6页。

⑤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

的经济不平等，必然造成富人与穷人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及平等问题时指出“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①所以要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不均，打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不平等，必须“以阶级为基础”^②，使“政府采取的矫正性政策必须超越只针对个人的决定，要着力解决阶级不平等，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做出改变的责任”^③，从而还人以真正平等。

3. 资本主义的正义不正义

自由市场经济驱使下的人与社会的不正义不仅表现为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第一世界对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第三世界的不正义，还表现为资产阶级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无产阶级的不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小约翰·柯布曾指出“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做出的开发工作，实际上很少使第三国家的大多数人受益，商业投资在这方面甚至更少。总的来说，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把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而使少数人变得富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政策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土地，这些人充斥于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周边的巨大贫民窟中。”显然第一世界国家的政策并不是为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而是在进一步对它们的无情掠夺与压榨中让它们陷入贫困与混乱之中，第一世界的国家正是通过这样的政策进一步加剧并强化了两个世界之间的不平等，它的种种“投资和援助摧毁了这些国家的自给自足，而且使得之前依赖自身的大多数人不能再照顾他们自己了”，显然“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在国际投资和援助的情况下变得更好”^④，反倒是在披着扶持政策“外衣”的第一世界国家的疯狂掠夺中使这种不正义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了。

除此之外，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强烈地痛斥，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正义是极尽粉饰与遮蔽它们的剥削本性的正义，它们一方面极力压榨雇佣工人无偿为它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用微薄的薪资去解释它们与雇佣工人之间体现为收支平衡的所谓正义，但这种做作的掩饰依然暴露了从头到脚都在滴着肮脏的血的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的本性，依然清晰地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正义，而这些不正义也直接体现在自由市场经济对政府与国家的“绑架”、对社会资源的过度占有以及对穷苦人民的“奴役”上。

自由市场经济暴露出的唯利是图性、盲目滞后性直接导致整个国家要为生活在金字塔顶尖上的富人们丧失理性的趋之若鹜行为“买单”——“黑色星期五”的突然造访与急剧膨胀的“楼市泡沫”的突然爆破使得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系瞬间崩塌，国家与政府不得不对正义体系的重新修补来防止那些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穷苦人民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的为捍卫自身正当权利而发起的激进行为；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被大资本家、大财阀集团们毫不留情地收入囊中，垄断性占有与经营使得越来越多的雇佣工人与普通民众被挤压到贫困线以下，眼睁睁地看着商品堆成山，却依然在领着可怜的救济金，在救助场所门外徘徊，梦寐以求地想进入门里面那个小到再小的栖身之处，幻想着总有一天能够安享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背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公平正义。

不得不说，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雇佣工人与普通民众不仅在身体上，更在思想上被自由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4页。

②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6页。

③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7页。

④ 〔美〕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01页。

场经济戴上了不正义的“镣铐”，他们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公平正义之中为争取自身那份微薄的收入让人感到可怜，却又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正义而做出无法度量的牺牲，直至付出生命。除此之外，那些数量只占 20% 却占据了 80% 财富的资产阶级所做出的对自然、对社会的横征暴敛行为以及由其导致的种种灾难需要由剩下的 80% 的穷人来承担，付出沉痛代价。

显然，资本主义的正义并非真正的正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也绝非真正的自由，它们忽视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只是单向度地为了发展自己而推倒正义，肆意践踏他人的自由。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表现出来的地区间的不正义、阶级间的不正义、群体间的不正义和个体间的不正义，共同构成资本主义本身的不正义。

实际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还只是资本主义不正义的现象，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资本主义一切不正义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正义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正义的根源，这就表明问题的彻底解决在于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三、社会与自然对立的缓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解决方案

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回到社会与自然的对立，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展开过程中所呈现的内在逻辑。在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探讨延伸至人与社会的对立时，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也逐渐浮出水面。为解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不自由，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发展绿色国民生产（The Green National Product）；为解决人与人的不平等，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打造共同体经济；为解决人与社会的不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更是提出借鉴中国“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蓝图。

1. 发展绿色国民生产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开出的“生态药方”

绿色国民生产与我国提出的绿色 GDP（The Green Gross Domestic Product）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将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和海洋）与环境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之后得出的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即将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负面影响”——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以及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或砍伐资源使生态环境从质量上日益恶化——从 GDP 中扣除之后所得到的真实的 GDP 数据。简单来讲，就是从传统 GDP 中扣除对环境影响的成本。

有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提出发展绿色国民生产，不仅是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长远发展的考虑，也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规划。资本主义“无限制经济增长”的神话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不竭利用基础之上的，而残酷的事实是自然资源正在加速它的枯竭：每 20 分钟就会有一种动物或者植物从地球上消失，地球上的生物正以每日减少 160 种的速度在不停地灭绝，而每年则有大约 1 万—2 万个物种灭绝。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物种正加入到这个加速灭绝的队伍中，例如科学家也曾一再警告石油资源将在 2050 年彻底消耗殆尽。

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摒弃人与自然对立的发展观，将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协调统一起来，将对自然的损害降到最低，使 GDP 的生态成本越来越小，走向一种生态的可持续的福利，即绿色国民生产。

2. 打造共同体经济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规划的经济方案

一直以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繁荣是以牺牲人与人的经济平等地位为代价的，是

“以收入上的不平等的增长为代价的，这既包括国内的不平等，也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平等”^①。除此之外，资本家只能看到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更大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共同体，雇员和供销者的利益”^②。

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指出他们所追求的发展是一种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以实现人民共同福祉为旨归的经济发展，只不过这种发展是一种和谐、均衡的发展，是一种对一切生命负责、厚道的发展，因而可以称之为共同体经济学。依据小约翰·柯布关于共同体经济学的观点，“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表明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尽管存在分歧却仍然可以共有一个共同身份”^③的共同体。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共同体不仅有效地抵御了其他共同体经济的侵蚀，而且强有力地、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的自我认同感”，将国家视作并努力打造为一个共同体，“关心国民的福祉”“肯定国民的多样性”，大力“提倡为国家共同体服务的经济学”^④。而在进一步实施共同体经济学的过程中，小约翰·柯布又明确谈道，“就具体应用于乡村发展的共同体发展而言，通常需要将这个乡村作为发展单位，让村民自己来做出决定。结果通常是提高了他们的生产能力”^⑤。

除此之外，共同体“它的成员能够广泛参与到支配其生活的决策中，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成员负责，尊重成员多样化的个性”^⑥。当然，还应当积极推动西方人传统观念中的理财学向家政学转变，因为家政学存在三个明显的优势“第一，它着眼于长期目标而不是短期目标。第二，它考虑的是整个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交易各方的成本和收益。第三，它关注有限的积累而不是对无限积累的刺激。”^⑦所以，向家政学的转变表明共同体经济学关心总的经济增长，优先考虑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成果进行重新分配，资源配置的目标主要是为国家最贫穷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及在传统基础上，制定一个积极推进文化多样性的政策。

3. 借鉴中国“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蓝图

有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看到，严峻的生态形势已促使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生态问题并采取了大量积极有效的措施。近些年来，中国洪涝、干旱、滑坡、泥石流、地震和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物多样性不断锐减，生态危机正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这个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想要继续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和繁荣的话，生态文明的建设就是迫切需要的。”^⑧因而中国政府正不断从顶层设计中激发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决心，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起重要角色。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以“美丽中国”为标志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① Tomas Miklos, "Preface." in Denis Goulet, *Mexico: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Futur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p. 6.

② NicMarks, "GDP growth is no measure of societal progress",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

③ [美] 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

④ [美] 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

⑤ [美] 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

⑥ [美] 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⑦ [美] 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⑧ 李惠斌《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9页。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① 正是在党的十八大上，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格局正式形成。2015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及时提出，表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成为“五位一体”战略发展布局中的重要部分，更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的中国智慧。

实际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也因此真真正正地落实、落细与落小到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中，例如，体现在退耕还林还草，放弃竭泽而渔的观念而进入休渔期上，体现在谁开发谁保护以及负面清单的责任制度上，体现在切实保护生态系统稳定性，全面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上，体现在“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理念上。当然，更体现在制度、秩序等文化建设方面，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也就是说，在为了全人类谋求一个更加适宜生存的星球的建设上，中国人民将更加致力于“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更加致力于“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及更加致力于“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与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②。所有的实践行为都积极表明，中国“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对人与自然“整体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坚持。

有机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中国关于人与自然“整体性”、人人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大智慧，提出将“中国传统智慧——‘天’‘气’‘理’等”^③纳入生态问题解决中来，“鼓励人与自然等更大的整体和谐共存”^④的理念带到自由资本主义。因为“西方领导人通常缺乏远见，习惯于按部就班地管理他们的城市和国家”，加之“缺乏一个整体的视角”，他们无法正确把握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那些他们创造的“独立的成就不能聚集成一个内在连贯一致的伟大文明”。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将宝贵的“他山之石”——中国“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蓝图与生态“整体观”引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带给西方领导人，以使“开明的领导者会对他们正在努力追求实现的整个体制或文明持有更彻底完整的整体观”，形成一种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整体生态观，并“从这个整体性视域出发”，“为每一步的发展做出明智的选择”^⑤。

基于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像中国一样积极主动地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之中，在经济建设中增加更多“生态含量”，而不是决绝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二元分割；应该像中国一样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辩证统一。除此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要积极借鉴中国关于人人共建、共享生态文明的思考——不仅严格遵循“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制度，更要最大限度地释放生态文明建设的红利给每一个人。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堂而皇之地以邻为壑——将自身经济发展的废弃物、污染物甚至有毒有害物质转嫁、倾泻至其他国家或

① 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百问》，北京：党建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② 本书编写组《十八大报告辅导百问》，北京：党建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③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

④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⑤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

地区——而是要在自身恰当解决生态问题与尊重其他国家生态权利的有机结合中实现共建、共享的生态文明。

当然，对于本国人民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应该像中国一样明确主体、细化责任，及时反馈，终生追究，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生态责任，晒出生态足迹的清单；不再让贫苦人民为富人阶级的非理性的暴殄天物行为买单，不再让穷人因为富人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付出沉痛的代价，沦为无辜的“替罪之羔羊”“刀俎之鱼肉”，从而在人人共建、共享中打造一个“整体性”的生态文明。由此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在生态经济意义讨论问题的，而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批判相媲美。

当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蓝本为全球生态问题解决提供方案之时，一方面感受到其对中国社会的重视和善意，另一方面当我们反思生态文明是否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我们又产生极大的怀疑。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性问题就其根源来说是制度问题 and 经济问题，是彻底的矛盾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层面而已，生态问题作为一个现代性问题，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自身危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同样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条件下，空谈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如何的问题，而缺少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实有效策略，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实际上，只有解决人自身的问题，才能解决人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及人与人建立于剥削基础上的不平等关系，生态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只有摆脱乌托邦式的理论幻象，才能真正迎来一个新世界。

参考文献:

- [1] John B. Cobb, Jr., *Spiritual Bankruptc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0.
- [2] John B. Cobb, Jr., *The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 [3] Ozay Mehmet, *Westernizing the Third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4] 〔美〕赫尔曼·E. 达利、小约翰·B. 柯布 《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 [5] 〔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汀·海因泽克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编辑：汪世锦)

敬告作者

根据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科院“名刊工程”建设要求，编辑部进一步加强管理，严格按程序实行双向匿名审稿。所以，请作者将纸稿（附上联系方式）直接寄编辑部，如发电子版给个人（包括主编、主任等）收转，将影响该文进入正常审稿程序。

特此告知。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

2016年6月